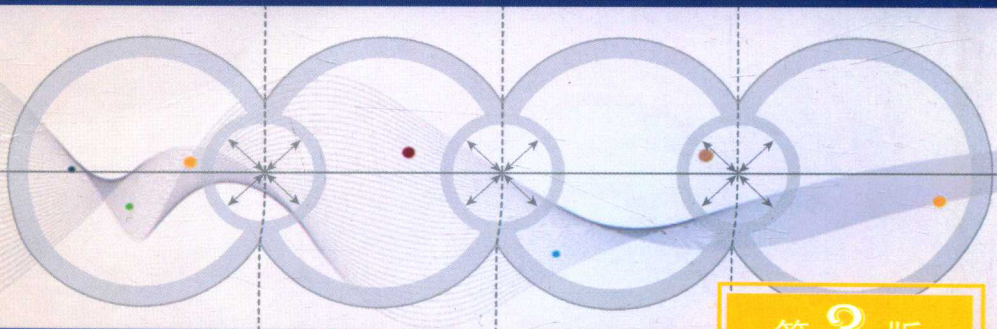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Ed

第 3 版

朱丽叶·M.科宾 (Juliet M. Corbin) 著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 (Anselm L. Strauss)

朱光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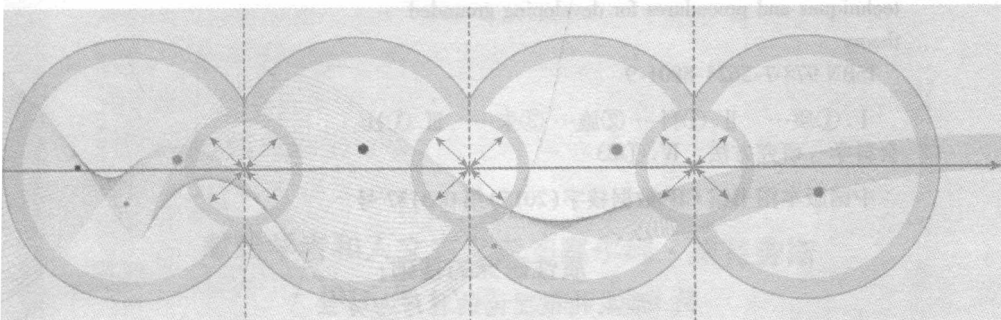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Ed

朱丽叶·M.科宾 (Juliet M. Corbin) 著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 (Anselm L. Strauss)

著

朱光明 译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的基础: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美)科宾(Corbin, J. M.), (美)施特劳斯
(Strauss, A. L.)著;朱光明译.—3版.—重庆:重
庆大学出版社,2015.2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ISBN 978-7-5624-8801-9

I. ①质… II. ①科… ②施… ③朱… III. ①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 IV. 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137号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
第3版

朱丽叶·M.科宾 著
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
朱光明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荣
责任编辑:邹荣 版式设计:邹荣
责任校对:邹忌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2.875 字数:345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5624-8801-9 定价:4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通过研究实例展示扎根理论的发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由两位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出版的合著《扎根理论的发现》中首次提出的(Glaser & Strauss, 1967)。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位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对这种研究路径(approach)进行了一些修改,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包括专门讨论扎根理论方法论的书籍和实地研究的案例(Glaser, 1978, 1992; Glaser & Strauss, 1965, 1968;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Strauss et al. 1975, 1985; 卡麦兹, 2009)。本书即施特劳斯的学生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在两人1990年合著的同名书基础上,修改后形成的第3版发表于2008年。施特劳斯于1996年去世,目前第3版的第一作者由他改成了科宾,他成了第二作者。该书的第2版发表于1998年,2014年出版了第4版。由于翻译滞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译本是该书的第3版。

扎根理论并不是一种实体理论,而是一种研究的路径(approach)(潘慧玲, 2005),或者说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Corbin & Strauss, 2014:6)。它可以被看作是质性研究领域众多路径中的一种,其他路径有:民族志、现象学研究、叙事探究、话语分析、传记研究等(陈向明, 2000)。它与其他路径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的目的是从经验资料(empirical data)中生成(generate)理论,而不只是描述和解释研究现象,或针对被研究者的叙事结构、话语特征或生活史进行分析。因此,研究者需要时刻保持生成理论的心态,采取“理论性抽样”的标准(而不是人口学变量的标准),根据生成理论的需要选择研究对象,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从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验理论。在生成扎根理论的过程中,研究者也需要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理论,在经验研究、个人知识和前人理论之间形成对话。扎根理论研究的结果是对现实的理论

呈现,因此需要研究者采用具有一定抽象程度和概括性的语言对结果进行表述。

扎根理论的提出,基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三种主要趋势的批评(Glaser & Strauss, 1967)。其一,大部分学者习惯于照搬已有学术大师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涂尔干的自杀论等),使用逻辑演绎的方法,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对其进行验证或局部修改。这么做的结果是导致“理论资本主义”(theoretical capitalism)的形成,极少数学术大师垄断了理论的生产,而大部分学者则沦为验证这些理论的“无产阶级”。其二,绝大部分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仅仅局限于对研究现象进行“印象式”的描述,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阐述。这类文本虽然生动有趣,但研究结论稀松、平常,难以与学术界其他理论对话,也难以被世人记住。其三,一些研究虽然提出了不错的理论,但没有介绍理论生成的方法、步骤和过程。而扎根理论研究者认为,衡量理论是否可信和好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理论生成过程的判断。如果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如何生成的,则很难判断其可信性,更不知如何运用。因此,扎根理论研究希望在理论和资料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在经验资料、已有文献和研究者个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生成理论。

扎根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和哲学中的实用主义(Glaser & Strauss, 1967)。前者认为,社会、现实和自我都是由人们的行动和互动建构的,因此需要通过行动者的视角理解他们的世界。后者认为,事实和价值是相互关联的,有用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丰富多变的,需要通过观察、实验等系统的方法从变动不居的经验事实中提炼理论。根据格拉泽的观点,扎根理论研究归根结底要做的就是:呈现行动者在处理某个问题时的行为变异(variation),找到各种可能的行为模式(pattern),并将这些模式用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Glaser, 1978)。

在本书的第1版,施特劳斯和科宾对扎根理论的资料编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Strauss & Corbin, 1990)。他们不仅介绍了三级编码的步骤(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而且提供了一些提高研究者理论敏感性的技术。在轴心编码阶段,他们还提出了一

个编码范式模式(paradigm model),将不同类属联结起来:(A)因果关系——(B)现象——(C)情境——(D)中介条件——(E)行动/互动策略——(F)结果。科宾在本书的第3版中,对这个模式进行了修改,在“行动/互动”部分增加了“情感”的内容。此外,她还引用了沙茨曼的“解释范式的矩阵”,使分析的层次更加丰富:

(从)视角

(属于)维度—属性

(在……中)情境(在……下)条件

(具有)结果的行动/过程

格拉泽与施特劳斯的编码思路有所不同,只有两级:开放编码和选择编码,分别对应两类代码:实质代码和理论代码(Glaser, 1978)。开放编码对研究领域内的经验实质进行概念化,形成实质代码;而选择编码则将实质代码通过假设联结起来,整合为理论。为了帮助研究者实施选择编码,格拉泽根据社会学分析的一般通则,提供了18个理论代码家族。

也许是由于学界对扎根理论提出了过于技术化、程序化的批评,也许是后来受到建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科宾在本书前言中有所提及),科宾在第3版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除了在章节开篇保留了三级编码的概念定义,正文中不再涉及具体编码的程序和技术,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灵活、多样的备忘录,呈现了作者为开设扎根理论课程而专门从事的一项研究的具体过程。作者在施特劳斯生前对一位曾经在越南作战的美国老兵的访谈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又联系了两位受访者,一位曾经在越南作战,一位曾经在其他地方作战。为了呈现当时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的初衷以及各类参战人员的思考和感受,她还广泛收集了当时的政府文件以及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回忆录和小说。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连续性分析,她最终形成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概念类属及其属性。

通读全书后,我认为,本书最出彩的部分是第8章到第12章。这五章系统地介绍了作者对越南参战老兵进行研究的具体步骤、方法、过程和结果,内容分别是:形成概念,阐明分析过程,分析情境,将过程纳入分析,整合类属。作者主要通过撰写备忘录,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微分析”,将研究一步步往前推进。读者会看到,有时作者一天会连着写若干个备忘录,不断对资料进行概念

化、类属化,寻找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并在不同类属之间建立联系。更为有趣的是,作为一位女性研究者,科宾甚至提到,自己某天做饭时突然灵光乍现,赶紧坐下来记下这宝贵的灵感。

正是如此这般的内容,使本书与第1版相比,几乎可以说变得“面目全非”了。作者如此大刀阔斧地对原书进行修改,在我看来,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扎根理论的资料来源可以是多样的、不拘一格的。研究者既可以自己亲自到实地收集资料,也可以通过网络收集资料;既可以借用其他研究者的资料,也可以使用政府文件和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既可以将新闻和文学作品作为素材,也可以借助研究者自己的个人轶事。其实,这一点在扎根理论的两位创始人那里一直是得到认可的,科宾在此只是身体力行而已。

第二,作者似乎在暗示:三级编码不一定是必需的。在我看来,虽然三级编码的技术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较快地形成分析思路,但分析的方法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逐字逐句地进行编码,也可以写备忘录、画图表,还可以等待灵感的降临(当然,如帕斯卡尔所言,灵感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大脑)。此外,编码其实不必局限于三级,分析的上限可以是无止境的,可能会有第四级、第五级。重要的是研究是否提出了新颖的理论,理论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研究现象,理论生成的各个环节是否具有逻辑连贯性,理论的内容是否密实并具有较好的整合度,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作为支撑。

不过,虽然如此猜测并表态,我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扎根理论(至少施特劳斯版本的扎根理论)的长处就在其系统的分析步骤和编码技术,而本次修改幅度却如此之大,几乎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编码步骤和过程。然而,科宾却仍旧将施特劳斯作为作者之一(虽然从第一作者变成了第二作者)——这不禁令我怀疑:如果施特劳斯还健在,是否会同意科宾所做的修改?不过,通过比较本书的第1版和第3版,我发现它们各有长处。前者对三级编码技术和分析步骤介绍得非常详细,并列举了具体实例加以说明。而后者对通过写备忘录推进资料的分析、形成理论性抽样的标准等提供了一系列范例,有利于读者开拓思路。也许,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阅读,也可以结合阅读二者,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出版的本书第4版(Corbin & Strauss, 2014)中,科宾将第1版和第3版的内容进行了有机的整合。第4版的内容被分成三大部分,共19章。第一部分有11章,对扎根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做了系统介绍。第1—2章讨论了质性研究的定义和功能,以及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论的扎根理论及其理论基础等问题。第3—4章探讨了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处理伦理问题。第5—10章介绍了三级编码(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的过程,包括概念类属的形成,理论抽样的标准,写备忘录和画图表的方法,对情境和过程进行分析,整合理论的思路等。第11章介绍了如何使用计算机程序对资料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有5章(第12—16章),通过作者对美国赴越南参战老兵的研究实例展示了扎根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这个部分的内容与第3版中第8—12章十分类似,但更加明确地呈现了形成类属、属性和维度的过程,而且增加了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在提供一系列备忘录的同时,专门提供了方法笔记和个人日记。第三部分(第17—19章)探讨了如何写作扎根理论的报告和论文,如何衡量扎根理论研究的质量,并回答了学生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在每章后面,作者都提供了参考文献、可思考的问题和复习作业,有的章节后面还提供了作者的学生对本章内容的反思。我感觉,第4版大大丰富了扎根理论研究的内涵,很好地结合了第1版和第3版的精髓。由于目前我们还没有翻译第4版,因此有机会了解第3版的内容,对有兴趣的读者应该也会十分有用。

将本书引入我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扎根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质性研究的各种路径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扎根理论是除了民族志之外,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路径。其他路径都是晚近兴起的,而且(除了现象学研究)都可以将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资料的方法。此外,我国社会科学界虽然对扎根理论有所了解,但对其作用存在一些误解(如将扎根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分析资料的方法),而且对这种研究路径的操作技术也不够娴熟。虽然近年来质性研究在我国不断升温,但绝大多数初学者的研究仍停留在描述层次,理论提升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希望通过本类书籍的引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对扎根理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经验资料与理论

建构之间架起桥梁,超越“理论资本主义”和“猎奇式”描述,创造更多符合我国国情的、扎根于我国本土实践的理论。

参考文献

-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卡麦兹. 建构扎根理论[M]. 边国英,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潘慧玲(主编). 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Corbin, J. & Strauss, A. (2014).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 Glaser, B.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The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1992). *Emergence vs Forcin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8).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Sage.
- Strauss, A. et al. (1975).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t. Louis: The C. V. Mosby Company.
- Strauss, A. et al. (1985).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朱丽叶·科宾(Juliet Corbin)(护理学硕士,护理学博士,家庭护理师)是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大学的护理学院社区卫生护理专业的一名临床指导教师。她与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合作撰写了《质性研究的基础》(1990)第1版和第2版、《无尽的工作与护理》(*Unending Work and Care*, 1998)和《构造一个新的卫生保健系统》(*Shaping a New Health Care System*, 1988),以及《实践中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 1997)等作品。她的研究兴趣、教学、演说和著述都是在质性研究方法论、慢性病以及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内。

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出生于1916年12月18日,于1996年9月5日去世。去世时,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弗朗西斯科)社会和行为科学系的荣誉教授。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都是在健康和疾病社会学(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等专业领域中。他做研究的取向是质性的,目的是要建构理论,他和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是扎根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很多年,他一直是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康斯坦斯大学、哈根大学及阿德雷德大学(Adelaide)的访问教授。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很多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与其他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有《死亡的意识》(*Awareness of Dying*, 1965),《镜子和面具》(*Mirrors and Masks*, 1969),《专业、工作和职业》(*Professions, Work and Careers*, 1971),《谈判》(*Negotiations*, 1978),《医学工作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Work*, 1985),《无尽的工作与护理》(*Unending Work and Care*, 1988),以及《行为的连续排列》(*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1993)。在他正式退休之后,他仍然积极地进行研究和写作,直到生命结束之际,其研究主题包括医院工作和社会学视角中的身体。

前言

在我的理性深处也许就是这样的感觉——社会现象世界是错综复杂的,无论你认为这一想法是多么天真。复杂性既让我着迷,又困惑了我大半生。如何阐明部分的复杂性,整理它,而不是对它感到沮丧或被它打败?如何不要因为过分简化了其存在而回避其复杂性或扭曲了对它的阐释?当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抽象化(理论)必然是简化的,然而为了深入理解,为了梳理,某种程度的抽象又是必需的。如何在扭曲和概念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Strauss, 1993, p. 12)

每当作者被要求去修订一个文本时,总有这样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他们会说:“还需要再修改吗?在过去的版本中,一切不都已经说过了吗?”我曾经就是这样想的,然而当我阅读本书第2版的时候,我意识到,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无论是质性研究领域还是我自己,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我阅读现今有关质性研究的文献时,似乎我的理性是在恐龙时代学习成长起来的。带着我内在的价值、信念、态度,以及我的专业知识和时代,我相信我所听到的,并将其记录下来。但是有一天,我环顾四周,竟然发现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后实证主义者(post-positivist)”的标签(Denzin, 1994)。“哦,亲爱的,”我想,“我已经被归类并贴上了标签,就像我们在质性研究中所做的那样。”这看起来就像是在我平常去上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质性研究革命。作为这场变命的一部分,“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从前质性研究中的“代名词(by-word)”。变得“过时了(passé)”。新的质性研究术语集中在让参与者为他们自己说话。而且,现在人们能够接受“追求本土化(go native)”,而这在过去则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事情变得更糟

糕。我了解我的研究世界,像蛋形人(Humpty Dumpty)*那样,当“客观性”这个概念因为不可能实现而消失了的时候,我的研究世界崩溃了。与成为“客观的研究者”相反,后现代运动恰恰将研究者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然而,对我的研究认同最致命一击的是,有人认爲,能在资料中把握“实在(reality)”的观念(notion)只是一种幻想。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有“多重视角”。后现代时代已经来临,一切都已经“被解构”和“重构”。

毫无疑问,当我听到这些新的理念时,我只是有点儿愤怒,也 有点儿担忧。我担心研究者会变得“过分关注他们自己的肚脐眼(navels)”以及“讲述动听的故事”,以至于忽视了研究的目的和责任(至少从我的观点来说),而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生产经验化知识的专业躯体。最重要的是,我担心,无论质性研究在“科学世界”中已经积累了什么样的信度,它们都将变得松散。然而,随着我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思想提出的有些观点有其合理性。随着我最初研究的“泡沫破灭”,我想知道还留下了什么。我得加上这样的“坦白”,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我在世界各国做了大量有关如何做分析的教学活动,而和学生的互动也有助于形成我对质性研究的新理解。

直到有人请我写本书的第3版,我才开始考虑将我的这些想法集中在一起重新思考。在为本书拟定写作提纲的时候,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方法是什么?它们仅仅是一系列的程序吗?或者它们只是一些几乎不包括任何程序的哲学取向?程序在研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们是指南,或只是一套大致的思想?需要给学生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以及给予多少?研究者的角色是什么?在讲述参与者的故事的时候,研究者如何才能得到承认?诠释的范围应该有多大?

在写作新版本中,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本书中我作为一名研

* 蛋形人(Humpty Dumpty)是英语童谣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曾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出现,在英语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译者注

究者的定位。我接受的训练就是成为一名扎根理论学者。在我学习的时期,恐怕只有一种“扎根理论”取向,尽管这个观点有待商榷。过去这么多年,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取向,它们都是扎根于资料以建立理论。每一种发展都是一种对原初方法现代化改革或扩展的尝试,从而使得扎根理论和当代思想更加一致。我还想坚持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方法论愿景,虽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但是直至去世,他一直相信理论的价值及其对任何专业知识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不再相信理论建构是发展新知识的唯一途径。

深描、案例分析、改变困境以及讲故事,这些对于做研究都是合理的原因。每一种形式的研究在其自己的方式上都具有说服力。我开始意识到,为了真实对待施特劳斯的愿景,同时仍然坚持我自己的信念,本书中,除了理论建构,我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以容纳其他的研究目标。然而,正如本书前言对施特劳斯的引用所指出的,依然存在整体的复杂性问题。由于复杂性对施特劳斯来说太重要,所以本书中所呈现的方法无疑需要提供一种理解某种复杂性的途径。换句话说,我必须寻找一种途径,将科学的艺术、解释和复杂故事的讲述——这些品质肯定是施特劳斯写作的特点——融合在一起。那些非常了解施特劳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不过也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著作在科学上的贡献。

不用说,考虑到这些,我担心自己是否敢于面对第3版写作所面临的挑战。当我开始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是相当害怕的。我犹疑不决、开始着手写作,然后又重写,就像一个人在思想实验时所做的一样。但是当我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时,我发现自己在享受这个过程。我发现,我不是在描绘一整套新的方法,而是在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modernizing the method),去掉一些教条,使一些程序更加灵活,甚至考虑如何通过计算机改进研究过程。

在《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将安塞尔姆的愿景记在心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再造他的方法去分析,而是

要将老版本中有价值的东西和当代思想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我并不希望被贴上一个“这个”或“那个”的标签,因为一旦使用了标签,往往就摆脱不掉。标签不会考虑时代在变化、知识在变化,尤其是,和这些变化一起的人也在变化。

本书建立在这样的信念基础之上,即尽管从一套资料中能够建构多种解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创造概念依然是一种有益的研究贡献。这里的有益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增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日常行为、习惯、疑惑及议题,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解;其次,概念提供了一种用来研讨和争论的语言,从而促进共同的理解和意义的形成。这些理解能够用来建立一种专业知识,并可以用来改进实践。

《质性研究的基础》第3版并不是一本做质性研究的食谱,而且我也反对别人这么看待它。它只是呈现了一套分析的技术(techniques),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使得一大堆资料变得有意义。我们鼓励研究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procedures)。然而,有一件事情我需要特别强调。研究者应在研究的一开始对研究要走向哪里非常清楚。如果研究目标是描述,那么,很好,就朝着描述的方向做。我只是希望研究者去做“高质量的”描述,使用这本书应该有助于他们的描述。然而,如果研究目标是形成理论(develop theory),就应该整合研究发现,从而形成一个良好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模型。大多时候,人们做的是描述,却称之为理论,这让读者对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感到非常困惑。

如何做质性分析并不是一件能够“被教(dictated)”的事情。做质性研究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感受。书本只能提供一些理念和技术(techniques)。个人要自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

读者会注意到,在本书的第1部分使用了人称代词“我们”,而在本书后半部分,人称代词变成了“我”。请不要感到疑惑,这是有原因的。本书的第1部分,包括所有的方法论步骤的章节,都是建立在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和我一起工作的成果基础之上——很多在本书先前的版本中都出现过。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是

使用越南战争的材料来展示如何作分析。这些都是新的章节,由我个人承担全部文责。虽然安塞尔姆·施特劳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他依然对本书影响巨大。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一起合作,因此,很难将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区分开。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我也一样,但是本书中所有的语言都建立在他对我教导的基础上。我希望,在这一版中,我能忠实于他,也忠实于现在的我。对于安塞尔姆来说,本书中的方法和步骤不只是一种做研究的方式,也是他了解生活的方式。

在第3版中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该书在分析上更加开放,反映了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其次,第1章一开始就说明了本书呈现的研究理路的理论基础。虽然这一章是在安塞尔姆去世前几年写的,本来要作为第2版的组成部分,但在付梓前,这一章的理论部分却被编辑删除了。也许是编辑认为它对于一本入门书而言太过于理论化了,而且为了压缩出版成本,必须要删减文字。第三,本书读者不只限于那些想要建立理论的人。理论建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的分析步骤。使用本书的人可以不必读到理论建构的最后一步也能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只要他们清楚自己并不是要去建构理论。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理论建构,但是很多分析的章节是专门针对那些对深描、概念分析或者只是对提炼主题感兴趣的研究者的。第四,在该版本中,不是仅仅谈论分析,我是真正地在做分析——带着读者从概念发现(concept identification)到理论形成(theoretical development)一步一步地分析。第五,和前面版本不同,这次在每一章的末尾都安排了一些练习来强化学习。第六,本书中还对如何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作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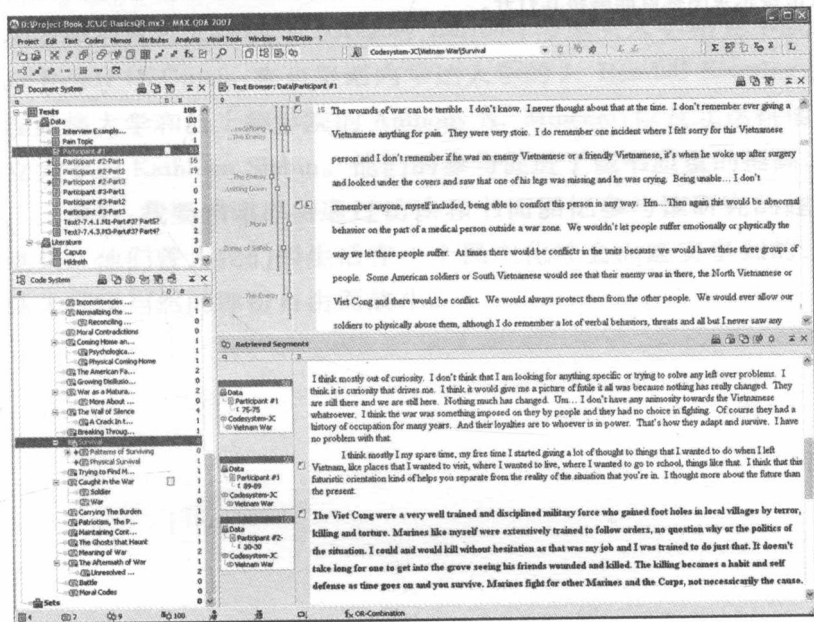
在我过去的岁月中,每一次教学的研讨班上,必然都会遇到关于在质性分析中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议题。虽然计算机程序的使用在质性研究中是有争议的,而且有些研究者是坚决反对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忽视。这里保留了用来研究分析的计算机程序,而且在现有的很多程序中,随着每一次的改进,它们对研究过程的支持能力在逐渐增加。注意,我说的是“支持(support)”而不是

“代替(take over)”或“指导(direct)”研究过程。我认为,此次版本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就是书中虽然增加了计算机程序的运用这一部分,但分析过程仍然是一个研究者驱动(researcher-driven)的思考及体验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者有时候僵化的运用了分析程序,这是不必要的。应该由演进中的分析来决定研究者如何使用计算机程序,而不是相反。没有理由将分析限制在计算机程序的能力范围之内。和本书中呈现的很多其他分析工具一样,计算机程序只是工具。它们能够提高研究者搜索、存储、分类以及检索材料的能力;它们有助于研究者跟踪自己的编码,为查看备忘录提供便利,以及辅助制作图表。而且,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不需要过早地投入一个确定的分析框架中去,因为计算机程序允许研究者不断移动材料,以其他方式去思考它们。一切尽在研究者的掌控之中。不再需要翻箱倒柜地从纸盒或笔记本中查找重要的备忘录。最后,计算机程序让研究过程变得透明。研究者能够追溯整个分析过程,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对“信度”感兴趣的研究者,计算机程序能够提供“审查跟踪(audit trail)”,能够追溯计算机程序分析过程,使得无论是在分析期间还是在分析结束评估研究过程都更加容易。不要忘记,研究者打算投入到分析中的劳动越多,研究的发现才越好。研究者必须要在过程中思考和感受自己的研究方式。计算机程序提供了一种选择、一种工具、一种辅助分析的手段,不要因它而转移了对分析过程的注意力。计算机程序并不是本方法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完成本书中的练习所必需的,只是放在其中作为一种选择。

本书中使用的计算机程序是 MAXQDA (Kuckartz, 1988/2007)。作者在此并不主张某种计算机程序优于另外一种,并且认为还有很多优秀的程序,其中包括 N-vivo、Atlas/ti 和 Ethnograph。但我碰巧使用了 MAXQDA,我之所以使用该程序,是因为它确实能够非常清楚明白且有条不紊地处理我希望计算机程序做的任务,而且它也相对比较容易学习和使用。再者,对于我这个非技术性的头脑,我能够理解它。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有关于

如何使用该软件的细节,以及它在分析的特定阶段和操作步骤中呈现出来的样子。并且,本书中呈现的资料和分析是作为 MAXQDA 的一个项目 (project) 准备的,读者可以免费从 Sage 网站 (www.sagepub.com/corbinstudysite) 或从 MAXQDA 网站 (<http://www.maxqda.com/Corbin-BasicsQR>) 下载。

这样,有了该软件,读者就有机会“当场”分析资料、补充编码、增加代码、撰写你自己的备忘录等。读者可以下载具有该项目的免费试用版 MAXQDA 软件,它的名字叫“JCBasicsQR. mx3”。它还有循序渐进的教学指导,轻松易懂地为你介绍该程序的基本功能。而且,你还会发现有关如何处理该项目的详细信息。



屏幕截图 0 该截图展示了“JC-BasicsQR. mx3”这个研究项目,它包括本书所有的备忘录和访谈资料。该项目可以通过下面的网页下载:www.maxqda.com,你还可以在该网页上找到使用该项目的所有必要信息。该屏幕截图展示了 MAXQDA 2007 的工作界面:四个窗口的主屏幕构成了质性研究资料分析的四个主要区域:资料库 (The Data Set) (窗口:“文件系统”);编码/类属 (the codes/ categories)